

日本東京銀座底層的店舖租金,貴到嚇人。若有商家在這裡租店面做生意,必定要利用好每一寸土地,營業時必定將商品擺得琳琅滿目。有一家書店的老闆偏不這麼做。他花了巨額資金開了一家書店,可每個星期店里只擺放一本書售賣。

書店直接以老闆的名字“森岡”命名。當初森岡租到這家只有幾平方米、空間極為狹窄的店面時,家人和朋友勸他經營一些有特色的、高利潤的商品。森岡卻執意要開一家書店,並且決定每周只精挑細選一本自己認為最好看、適合大眾閱讀的書放在櫃檯上售賣。

森岡做這個決定,與他之前的職業——導游,有很大的關係。做導游帶隊時,森岡有個很深的感觸。每次在熱鬧的大街購物,十之八九的遊客在開頭時都是挑挑揀揀、猶豫不決,往往是手上拿着一件商品,眼里又盯着另一件商品。當森岡提醒“購物時間即將結束”時,大家就會匆忙選擇幾樣商品,然後付款購買。而事後,總有人抱怨買的東西不喜歡。森岡知道,遊客購物時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,都是

# 祇賣一本書



由於商品太多、太雜。  
“當可挑選的對象太多時,你就會出現‘選擇困難症’。試問,當你從頭到尾都在糾結‘我該買哪本書’的時候,你怎么還會去關注某本你或許已經看中的書的內容是否精彩?”策劃開書店時,森岡這樣對家人和朋友說。正因如此,他果斷決定每周只賣一本書。  
一個每周只賣一本書的書店,能吸引顧客的眼球嗎?還別說,附近的許多消費者不但光臨了,還每光臨一次

必買一本擺出的書。原來,森岡除了經營“全店只有一本書”這個特色外,還在書店牆壁掛上不少藝術畫作、藝術飾品等。顧客每次光臨森岡書店,不用挑選,直接拿書,然後在濃鬱的藝術氛圍下靜靜閱讀一番。一般情況下,閱讀者少則幾分鐘,多則半個小時就會迷上書中的內容,然後直接購買走人。  
這樣經營一段時間之後,被擺上森岡書店的書籍必會成為當周的暢銷書。許多出版商得知後紛紛找到森岡推薦他們剛出版

的好書。這樣一來,森岡能在第一時間接觸到許多很好的新書,然後推薦給讀者。  
森岡書店開業至今不滿一年,卻早已盈利。  
書店可以幫讀者排除一切干擾,讓人們每周只關注一本書嗎?  
當初,森岡帶著這個疑問開了書店。如今,這個疑問已經成為他書店的經營理念。



“那你覺得呢?”我反問了齊齊。  
“我覺得他們不是為我好,是為他們自己。他們掌控不了自己,才想控制我,他們讓我做這些後,我真的會好嗎?”  
“我真的會好嗎?”我不知如

孩子聽話、懂事,按自己的規劃或要求去執行自己的命令。因為父母是過來人,知道怎樣做才對你好,所以你照做就是。父母不希望你以後經受挫折,不希望你以後的生活不好,所以一切都是為了你好。因此,“我都是為你好”已經成為很多父母的口頭禪,在孩子面前總是如聖旨般不可違逆。其實,從所謂愛的出發點去傷害孩子,比純粹的傷害更讓孩子痛苦。“我是為你好”,孩子無法反駁,父母是愛自己的,但是孩子不快樂,這不是他想要的。孩子會掙扎在這種矛盾的痛苦中。

# 孩子最不喜歡的一句話

閨蜜的女兒齊齊向我抱怨:“爸爸媽媽不愛我”。我很驚訝,因為我知道齊齊的爸爸媽媽是有多麼疼愛他們這個寶貝女兒的。“為什麼這麼說呀?”我試探地問。  
“他們總說為我好,愛我,可是我不感覺到他們的愛。阿姨,你說爸爸媽媽總說為了我好,真的是為我好嗎?”

何回答她這個問題。  
看我不回答,齊齊又開始自己滔滔不絕:“我感覺我像個機器人,沒有生命,沒有選擇。什麼都是他們替我選擇了,替我做了,那我還是我嗎?那是他們的人生而不是我的人生。那我為什麼要活着呢?”我再一次啞口無言。  
天下父母都一樣,都希望自己的

我們的愛不應該是簡單的告訴,不應該是嘮叨地規勸,更不應該是強制的命令。愛孩子,要瞭解孩子;愛孩子,要讓孩子真切感受到我們的愛。不能因為我們愛孩子而把我們的意願強加給孩子,強加的愛對孩子來說是負擔,強加的愛會令孩子喪失自我。  
真正的愛一定要顧及孩子的感受,反之就不是愛,而是控制。

# 硅谷並沒有發明什麼

而與此相反,舊金山灣區的高校則鼓勵其教員創辦他們自己的公司。  
人們可能會質疑,何以硅谷誕生在美國西海岸而不是東海岸。後者居民的教育程度更高、更加富有,也更加國際化。這其實是一種獨特的反現存體制的情緒,以及一種要改變世界的堅定信念使然。  
當人們在這裡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之後,硅谷便開始受益於其自產的百萬富翁的慷慨。慈善活動和天使投資為打造創造力提供了第二助力。“當你還不富裕的時候要有創造性,當你富裕的時候要支持創造性。”這可以成為硅谷創業者的座右銘。舊金山灣區的生活方式產生的社會壓力讓你必須“與眾不同”,必須“做到最好”。硅谷百強分布圖

“破壞性的創造”,這就是人們談起硅谷是創新工廠時的終極含義。那些離經叛道的個人才是這個故事的主角。  
為什麼硅谷出現在美國?總的說來,美國對這些人才比歐洲友善,而加州最為友善。比如,在歐洲,不穿西服、不打領帶很難成爲一個成功的雇員;而在加州,億萬身家的人穿的也是牛仔褲和T恤衫。  
硅谷的故事未必能發生在歐洲的另一個原因,在於歐洲人不願冒險的思維模式。我曾在一家歐洲的跨國公司工作過10年,每當一個工程師團隊有一個新產品的想法時,經理就會問一個很微妙問題:“有人干過這個嗎?”如果他們回答“是”,經理就會說“我們太遲了”;如果他們回答“否”,經理就會說“那就沒必要了”。這樣,工程師們就無法做什么新東西。而在硅谷,美國人敢於冒險的精神得以發揚光大。硅谷培育了一種敢於冒險的文化,進而把它變爲一種科學。

硅谷同世界絕大多數地方,特別是歐洲的另一個重要的不同之處,在於大學教師的思維方式。歐洲大學是靜止和封建的官僚體制,一位教授就好像一個男爵,他向助手們施以恩惠,同時他又是系領導的終身奴僕。

象已經成爲美國社會肌體的一部分,在硅谷尤其得到了最爲充分的體現。

因此,硅谷首先是一個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試驗田,然後才是一個科技和創業精神的試驗田。  
硅谷通過與烏托邦式的集體主義結成的三角關係,促成了先進科技與自由市場經濟的結合,從而使硅谷成爲一個多樣的世界。



關於長安和洛陽哪個更適合做首都,古代知識分子的看法是:長安有山河之固,適合應付變亂,洛陽有中土之美,適合德化天下。換成現代的語言,就是如果你擔心變亂,最好還是定都關中比較安全;如果你德行高超不怕變亂,那就定都洛陽。

長安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都城。它的影響,導致日後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詩作里用“長安”來指代北京城。選擇長安爲都城的理由很多,最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。就軍事關塞而言,長安周邊東有潼關、西有大散關、南有武關、北有蕭關,四座關口控制着進出長安的通道,都是易守難攻。就地理而言,長安處於一個安全的地帶。

當然,洛陽在唐朝中後期的崛起也有賴于它四通八達的交通優勢,只是,這兩座城市雙雙在唐朝末年衰落,它們在中國歷史上的輝煌也隨之戛然而止。

**安全還是糧食**  
長安城不是只有一座,歷史上有兩座長安城:漢朝的第一長安在今西安市的西北,隋唐的第二長安才坐落於西安市中心,它是隋文帝所建,當時不叫長安,而叫“大興城”。

隋文帝楊堅定都長安,有一個很現實的政治考慮。楊堅的力量建立在“關隴集團”之上。所謂關隴集團,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際。當時一代梟雄高歡控制了中國北部大部分地區,宇文泰走投無路,裹脅北方六鎮的余卒,西入關中,建立了一個關隴軍事集團。這個集團以關中爲根本,向東和高家爭奪天下,歷經險阻,最後終於獲勝。楊堅也是關隴集團的一分子,他是宇文泰的岳父,奪了女婿的天下,但他依靠的還是關隴集團的力量。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,楊堅當然就不敢隨便離開關中,只能定都長安。

但是事情到了他兒子隋煬帝時候,起了變化。隋煬帝離開關中,讓人造了一個新首都洛陽,又派人挖了一條大運河。按照傳統史書的說法,隋煬帝修建大運河就是爲了更好地尋歡作樂。但這個說法讓人難以相信,隋煬帝所作所爲的背後,其實有着一種理想主義的矯情。他試圖把帝國凝結爲牢固的整體,所以才會選擇位於帝國中央的洛陽爲新首都,並用一條運河把帝國連爲一體。

理想主義向來害死人,大隋朝滅亡了。隋帝國的崩潰主要原因當然還是窮兵黷武、濫用民力。但是背後可能還有一個重要原因,那就是隋煬帝營造洛陽後,遠離了關中,也就疏離了自己的力量源頭,因此招致覆滅。

有隋煬帝的前車之鑒,李淵只能把首都定在長安。但這樣一來,就馬上面臨一個問題:糧食。首都總要消耗大量糧食,光靠關中一帶不足以供給,唐王朝不得不從外地輸入糧食。按說隋

還逃得間不容發,狼狽不堪。永淳元年(682年),跟隨皇上逃荒去洛陽的扈從之士,居然一路走,一路餓死,沿途有許多餓殍。於是,洛陽城再度成爲一個有誘惑力的選擇。

相對於長安,洛陽最大的優勢就是它位於帝國的中央,四通八達,交通便利。李治也許是厭倦了逃荒,他開始提陞洛陽的地位,將它正式定爲東都,營建洛陽宮殿,稱長安和洛陽爲“東西二宅”。洛陽作爲副都的合法地位也就此確定。

到了武則天時期,她做出了更大膽的決定,將洛陽定爲帝國真正的首都,改稱“神都”,地位超越了長安。從此她一直待在洛陽,很少再回長安,政府機構也都轉移到了洛陽。洛陽在武則天統治下迎來了黃金時代,此後它再沒有過這樣的輝煌。  
**兩都的末日**

武則天垮台後,韋後和中宗急于返都長安,那里才是他們的權力基地。按理說,返回祖宗奠基之地,本是名正言順的,但大臣們幾乎是一片反對之聲。不少人上奏摺勸諫,奏摺里千言萬語彙成一句話:“長安沒有吃的,回不得呀,皇上!”韋後則反駁說:“自古哪有逐糧天子?”

從經濟上說,韋後的這個決定是不划算的,但是從全國戰略佈局看,選擇長安還是正確的。不過糧食問題不解決,就連唐玄宗也只能逃荒。根據歷史學家全漢升的統計,唐玄宗執政的頭二十五年里,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待在洛陽,而每

# 中國古代的定都哲學

煬帝的大運河可以解決這個問題,但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。

以江南糧食爲例,它們要被送到長安,需要走兩千多里的路程。其中真正的問題就在洛陽和陝州(今三門峽市陝縣)中間這段路上。這段路中間有三門峽,船過不去,只能靠牛車走崎嶇的山路,非常艱險,運量也很有限。

開始的時候問題還不大。李世民統治時期,政府規模很小,軍隊也是軍農合一的“府兵制”,一年往長安運一二十萬石糧食就夠了。到了唐高宗時代,政府規模急劇膨脹,長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,糧食就成了大問題,最後竟然到了幾乎要斷頓的地步。這時,隋煬帝留下的東都洛陽又成了救命稻草。

在唐高宗時代,一遇到關中歉收,李治和武則天就帶着文武百官到洛陽吃洛口倉的糧食。當然,長安還是首都。等到荒年過去,李治他們還回來,整個就是一副逃荒的樣子。有的時候逃荒



到了武則天時期,她做出了更大膽的決定,將洛陽定爲帝國真正的首都,改稱“神都”,地位超越了長安。從此她一直待在洛陽,很少再回長安,政府機構也都轉移到了洛陽。洛陽在武則天統治下迎來了黃金時代,此後它再沒有過這樣的輝煌。  
**兩都的末日**

武則天垮台後,韋後和中宗急于返都長安,那里才是他們的權力基地。按理說,返回祖宗奠基之地,本是名正言順的,但大臣們幾乎是一片反對之聲。不少人上奏摺勸諫,奏摺里千言萬語彙成一句話:“長安沒有吃的,回不得呀,皇上!”韋後則反駁說:“自古哪有逐糧天子?”

次去洛陽都是因爲糧食問題。  
痛定思痛,唐玄宗大力整頓漕運並獲得了巨大成功。到天寶年間,每年運往長安的漕糧高達四百萬石。四百萬石糧食可以供養差不多一百萬人,足夠大唐帝國政府運轉之用。有了這些糧食,大唐還可以在西北供養一支龐大的邊防軍,拓西域,抗吐蕃,滅勃律,屠石堡。  
長安的崇高地位從此牢不可破,洛陽則走向衰落。它繁華依舊,但再也不是帝國的軸心。唐玄宗也不必過逃荒的日子,他在晚年絕足洛陽,留在長安過着奢靡的日子,直到安史之亂爆發。

安史之亂幾乎徹底改變了中國,結束了所謂的中古時代。這倒不單單是因爲它的破壞性。它確實破壞了整個北方的經濟,更將兩都弄得凋敝不堪。除此之外,氣候的改變也是一個重要原因。

20世紀的科學家研究了中國的氣候變化,他們發現唐朝的氣溫要比今天高幾攝氏度,而且要濕潤得多。但到了唐末宋初,中國的氣候開始變冷,游牧和農耕的分界線開始南移,這個趨勢一直持續到清朝初期。北方的衰落,西北的凋敝,游牧民族的再度興起,這些現象背後都受這個力量的支配。

晚唐的歷史就是一部運河爭奪史。能控制住運河,能保持住漕運,帝國就能生存,否則就會崩潰。長安還能苟延殘喘,至於洛陽,到唐末殘破至極,最糟糕的時候,整個城市人口不滿百戶,恍若鬼城。

在爭奪運河的過程中,汴州(如今的開封)脫穎而出。它控制着汴河到黃河的人口,是運河的一個關鍵點。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運的財富。最終,軍閥朱溫以汴州爲基地,滅了唐朝,建立了後梁。隨後,中國的東西大動脈就此變成了南北大動脈,這個格局一直持續到了清朝。

趙匡胤曾一度有過猶豫,考慮將首都移到洛陽,並最終轉移到長安,但這個方案最終沒有實行。因爲沒有人能對抗緩慢的大趨勢。日漸寒冷的氣候,凋敝的西北,東北方敵人的崛起,以及黃河水文的惡化,使得帝國再也不可能通過大運河供養一個龐大的西北都城。長安也再沒能成爲任何王朝的首都。